

中·国·经·验·对·话·系·列

# 生·死·爱

## ——汶川地震对话录

东方相辉 著



在悲情激荡中解读汶川地震之消息，这是本书的一个出发点。其间观点，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完全落在真理的步点上，而在于能否就此开启一个共同语域，以培育吾中华民族之生动精神。惟此，东方之光辉才能照亮未来之世界。

5.12

 复旦大学出版社

生·死·爱

——汶川地震对话录

## “中国经验对话系列”总序

哲学是思的事业，而思是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之所以说它是当务之急，一则是因为思的事情似乎已长久地被疏远和搁置了，一则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当下境遇却以其高度的紧迫性将思——切近于中国经验的思——指定为一项根本的任务。这种状况使我们回想起黑格尔 1818 年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黑格尔说：精神上的深刻要求荒疏已久，“因为在短期前，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而当这种压力有所缓解之时，以往似乎很消沉的哲学便可以“重新提起它的呼声”。这种呼声的核心便是寻求和把握实体性内容的深刻要求。黑格尔声称，正是在这种实体性的内容里，我们看见了时代；而我们的任务和使命就是“在这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上培养起哲学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和其他人文学术一样，与其时代有着本质的关联——它是被把握在思中的时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哲学作为一项由我们的历史

生·死·爱

性实践所必然唤起的思的任务提示出来。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中根本不包含什么真正的实体性内容(即真理),在我们的未来筹划中根本不具备“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那么,哲学就是多余的,因为这里根本不存在真正思的任务,就像我们的精神领域如果已能够被现成安顿(无论安顿在何处)的话,那里也不存在真正思的任务一样。然而,在我们民族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实践中,难道不是始终贯彻着那种寻求真理的恒久热情吗?虽说这种热情时时居于对立和矛盾之中,并因而经常是高度紧张的和伴随着痛苦的,但这种紧张和痛苦难道不正意味着由时代的严肃性所不断激动起来的深刻要求,并因而往往是思之努力的确切标志吗?

只要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不止于单纯自然必然性的领域,并且不止于那种似乎可以直接通达现代性的现成道路,它就必然要为真正的思所贯彻,亦即要为具有原则高度的、创造性的哲学所贯彻。因为这里牵涉到的正是所谓“道”之开展——创辟路径,构建居所,并且使之能够被道说出来。惟其如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方始有可能使其独特性表现为必然的东西,也就是说,表现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体性内容。

然而,哲学目前的状况却远非有利。作为一般的观念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主观思想,而主观思想的要害就在于把真正的现实遮蔽起来,使之停顿滞留于晦暗之中。主观思想的观点盛行于所谓“外部反思”的哲学中: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反思不会停留于、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但却知道如何把一般的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这种外部反思,在黑格尔看来,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它从来不可能真正触到并揭示社会现实,相反却使之完

全被掩盖起来。所以,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尖锐批判,开辟出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20世纪的哲学从根本上来说则继续着对主观思想的批判任务。

只要哲学的意识依然从属于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就不可能真正绽露出来,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不可能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从而,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中正在生成的经验——“中国经验”——就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其意义已然被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先行褫夺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没有思也无需乎思,唯一的事情就是把现代性的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也就是说,用现成的抽象原则来粉碎、割裂和强制一切生动的和独特的经验。海德格尔在谈到其哲学的出发点时曾说,重要的是做出关于物自身的基本经验;但如果从“我思”出发,就根本无法做出这种经验。同样,对于当今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做出关于我们自身的基本经验;但如果依循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也就根本无法做出这种经验。在这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当主观的外部反思被认作是思的最根本的敌人时,思的航船才能够重新扬帆启航。

总之,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中果真包含着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思的任务,以便使这一实践获得世界历史意义,那么,这个思的任务就必然要求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以便使“中国经验”能够被切近地做出,使其意义能够积极地呈现出来。“中国经验对话系列”正是为此目的而被课题化的。其任务无非是:经由一些重大的主题而思入中国经验本身。这一任务具有双重的性质:它一方面要求着哲学之思使得中国经验的做出与开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要求着中国经验对于哲学之思来说成为本质重要的。

生·死·爱

我们在此系列中之所以采取“对话”这样一种较为始原的哲学样式,不仅是因为上述任务的双重性质——它需要在对话的过程中使彼此生成的方面逐渐明确起来,而且是因为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任务本身还只是在初始的展开过程中,因而必然地具有探索的性质——它需要在对话的过程中使思不断深化。这里的核心之点恰恰在于:正像我们民族的再度被青春化的历史性实践还远未终结、完成一样,作为这一过程之真理的实体性内容也绝无可能被一劳永逸地装进我们的口袋中。因此之故,我们才坚决地提出思的任务,并把这一任务领会为一种考验,即能否真正思入中国经验本身;而这种考验的可能性根据则来自另外一种更为根本的考验,即:中华民族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历史的承当——她把在其新的历史实践的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把握为并且铸造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体性内容。

无论如何,经历如此这般的考验乃是我们的命运。

“这里是罗陀斯岛,  
就在这里跳舞罢。”

吴晓明  
二〇〇八年八月八日

## 《生·死·爱》序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发生里氏八级地震，震动了整个中国。天崩地裂，手足顿时永隔阴阳；地动山摇，同胞瞬息命丧黄泉。大灾面前，国人挺身而出，地不分南北，位无论尊卑，义无反顾，抗震救灾。摇摇欲坠的废墟下，挖出了一条条危在旦夕的生命；余震隆隆的山巅上，救下了一群群走投无路的灾民。政府应对有方，民众慷慨解囊，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惊天地，泣鬼神。

这股绝处逢生的力量源自何处？如何从概念上把捉住这种极限状态下喷涌而出的民族精神？怎样才能使之生生不息，彰显于国民之日常生活？尤其是，在西方话语盛行于世的今天，如何重务中华之本，光大其独特价值，而不至于拾人牙慧于前，遭人耻笑在后？同时，在讴歌救灾义举之际，如何防止遮蔽灾难与死亡本身？在追求技术进步之际，又怎样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更为紧要的是，如何倾听这次灾难所透露的诸多消息，把天机适时转化为人文制度？

生·死·爱

复旦哲学同仁问学未敢忘忧国，痛未定而忍痛思痛，于是便有《生·死·爱》，一则祭亡灵安息，一则祈生者自重。

具体言之，方晶刚先生首倡此议，并以“生死爱”三字相赠。吴晓明先生嘉许之余，亲笔题写本书书名。胡华忠先生对此亦支持甚力，保证了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参加讨论者凡八人：邓安庆、汪行福、王新生、邹诗鹏、郝兆宽、陈军、叶晓璐和王金林。最后由陈军与王金林统稿，并经上述诸位同仁过目定稿。

在思情激荡中解读汶川地震之消息，这是本书的一个出发点。其间观点，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完全踩在真理的步点上，而在于能否就此开启一个共同话域，以培育吾中华民族之生动精神。惟此，东方之光辉才能照亮未来之世界。本书以“东方相辉”为作者名号，盖在于斯。不言而喻，这项工作目前仅仅是一个开端。

把中国经验形诸语言，吾辈任重而道远。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二日

识于复旦光华楼

## 目 录

“中国经验对话系列”总序 ▷1

《生·死·爱》序 ▷1

汶川地震对话录(一) ▷1

汶川地震对话录(二) ▷43

汶川地震对话录(三) ▷97

汶川地震对话录(四) ▷149

# 汶川地震对话录

(一)

时间:2008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座 2409 室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事 件

金林:事情起头我先讲一下。5月19日那天,我们几个人在教授餐厅吃饭,谈到要对汶川大地震作一些理论探讨,从概念上把握这样一场地震,尤其是抗震救灾中所激发出来的精神。这个讨论,不求其逻辑上的严密性,关键是要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经验有所言说。我们要把这次大地震中呈现出来的方方面面,那些真的东西、美的东西、善的东西,让我们感动的东西,都把握在思想中。最初的日日夜夜,我们天天守在电视机前,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希望发生些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废墟下还掩埋着许多生命,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救人。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情绪也好、感情也好、认识也好、体会也好,统统表现出来。如果能够引起国人的共鸣反响,那就善莫大焉。温家宝总理讲:“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养着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们现在就是自己看着办。

最初的日日夜夜,我们天天守在电视机前,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希望发生些什么……

当下中国的经验亟待言说

安庆:这次大地震对我们所有中国人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我们中国人面对这场灾难时的反应,所显现出来的空前的团结、友爱,对生

生、死、爱是哲学永恒的主题

的执著,对死者的悲哀、悲痛,在死神面前所呈现出来的坚忍与镇静,蕴含着一种非常深沉而又平常的生命哲学。生、死、爱,这是哲学永恒的主题,我们应该把它提炼出来;而且在汶川大地震这一整个事件中涌现出这么多的感人事例,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些铭记下来。

行福:这次地震,从它的结果而言,当然是一个悲剧。那么多人丧生,那么多人家园被毁,那么多人的爱也好、恨也好、情也好,随着这次大地震戛然而止。但是这个悲剧本身反过来也给活着的人,不管是在汶川、四川,还是在全国各地,乃至在世界各地的人,一个反思的机会,反思物欲掩盖下的价值。这些价值,平常也许大家并不知道,正因为有了这个大地震,很多人被推到了生和死的面前,面临着生死抉择。在这面生死之镜前,很多人一下子就清醒了许多。我们从报道中也能看到人的本性当中那些最善良的一面被激发了出来。那么,是否能有一种机制或一种文化、一种理论,把这些最善良的人性维系住,这恐怕是大家都要思考的。

诗鹏:汶川大地震显然是一次重大事件,不仅使灾区群众遭受莫大苦难,也对所有中国人造成了痛苦和震荡,但是,遭受到苦难和震荡的中国

人却愈加坚强。一个人一生总会碰到很多事件,但并非每一次事件都是重大的。事件是物与时间的高度集聚,其意义在于抛弃日常的琐碎与浮泛,通过生命的当下集聚方式将人与世界连接起来。汶川地震将生与死、人与自然、亲情伦理、社会关爱等一切可能的关系呈现出来,并使得精神的东西从物质层面跃起,由此激发人们的思索与行动。无疑,对这些关系的思索与集体性的自觉,也激起了大家的社会责任感。

事件使人成熟。而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要亲历若干重大事件,从而不仅在智性方面,也在心性方面全面走向成熟。无疑,在这次大地震中,整个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与表现,让人深深地感到:这一代人正在成熟起来。地震是天灾,但使得整整一代人走向成熟,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其实,何止青年一代,大地震实际上使整个中华民族一下子成熟和坚强起来,使得人们有理由从平庸琐碎乃至浑浑噩噩的日子中醒悟过来。

最近这些年,社会上盛行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是精神生活沉沦于物化生活的表现,它虽然也表现出各种狂欢的场面,但毕竟缺乏重大事件的历史深度与存在感,因而无法让人踏实。我们知道,形式化及表浅化的生活,浑浑噩噩乃至蝇营狗苟的生活,无法与事件关联起来,而

事件是物与时间的高度集聚,其意义在于抛弃日常的琐碎与浮泛,通过生命的当下集聚方式将人与世界连接起来。

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要亲历若干重大事件,从而不仅在智性方面,也在心性方面全面走向成熟。

一个不可能生发事件的时代,不管它表现上有多热闹,其实都已经滑入了虚无和荒诞。

搞搞乐子,弄点明星加粉丝式的热闹,多造几个“超女”之类,就更是谈不上什么事件性。可是,我们这个物化的世界,好像就剩下了造星效应的“事件”能力了。而一个不可能生发事件的时代,不管它表现上有多热闹,其实都已经滑入了虚无和荒诞。实际说来,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全方位走向市场经济以来,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就生活在这种很不踏实的境况中。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突然让人们意识到,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中,一定还存在着沉重的生命精神。当然我不是说,这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国人转型中的所有问题,对此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但是这个事件的确刺激了中国人,促使国人好好地想一想。这样的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相当大。

## 废 墟

行福:此次汶川大地震,温总理一开始就把它定性为特大自然灾害。一开始我听到这个词,没有多少感性认识,绝没有想到地震的破坏性如此之大,给人民的财产和生命造成如此大的损失。汶川大地震与其他灾难性事件相比,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废墟。地震瞬间摧毁了无数的

道路、桥梁，摧毁了一个个美丽的小城，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片片惨不忍睹的废墟。更恐怖的是在废墟底下埋着无数已经死亡和等待拯救的生灵。废墟不仅是地震破坏力的见证，甚至不妨把它看作整个地震的象征符号。因此，我想从废墟开始反思这次大地震。

谈到废墟，让我想起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提纲》，其中有一段话专门讨论废墟。本雅明借用超现实主义画家克利的一幅名曰《新天使》的画作，表达他对历史的理解。《新天使》描述了一个凝神沉思废墟后转身而去的天使，本雅明称她为历史天使。历史天使与常人不一样，在常人看来只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她看到的是一场场灾难，在常人看来，我们应当面向未来，可她却告诉我们要面向过去。本雅明说，在废墟面前，历史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把碎片重新弥合。但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使她无法收拢翅膀，停在废墟上，并且大风想要活生生地把她吹走，让她飞向她背朝着的未来。这个大风是什么，本雅明说就是人们相信的进步力量。不难想象，这里面有两种力的博弈，天使钟情于废墟，想停下来，在这里沉思，但来自天堂的风，挟持着进步的力量阻止她这样做。本雅明所说的历史天使面临的窘境，难道与我们当前的处境不是有几分相像吗？在抗灾尚未

遗忘有时是美德，  
有时也是罪过。  
对灾难的记忆是  
一个民族成熟的  
标志。

结束，死难者尸骨未寒之时，许多人就急于表功  
或为抗灾高唱赞歌了。这种心态是很危险的。

遗忘有时是美德，有时也是罪过。遗忘有  
时会使人变得很大，有时也会使人变得很  
小。我觉得对灾难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  
志。每个人都是如期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不仅  
与自己的先辈有隐秘的联系，而且与我们有一  
个隐秘的契约。他们的死亡不仅是他自己和家  
庭的悲剧，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悲剧。虽然  
死者不能复生，但死者应该在我们的铭记里得  
到公正的对待，必须使灾难原原本本呈现出它  
的意义。灾难不仅归于死者，同样也归于生者，  
只有当灾难真正作为灾难被人们缅怀和记忆  
时，人类才能真正地成熟。

我们生活在快速生产和消费的时代。我们  
快速地生产和消费物质产品，也同样快速地生  
生产和消费符号和意义。这个时代太容易把记忆  
当作负担，把遗忘当作美德。在反思汶川大地  
震时，我们应该有勇气做本雅明所说的历史天  
使，不仅唱颂歌，更要唱哀歌，不仅颂扬在废墟  
下抗争的生命意志，颂扬不顾个人安危拯救幸  
存者的伟大壮举，也要记住在大自然暴力面前  
人的无助和渺小，记住无数已逝的亡灵，记住废  
墟给我们带来的刻骨铭心的伤痛，记住希望的  
翅膀被折断后留下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废墟是